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19年12月

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灯塔”，宣称人民拥有参与公共事务、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治对立尖锐，社会撕裂严重，大批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金钱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金钱政治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了选民真实意愿的表达，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近年来，富人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力则日渐缩小。金钱政治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

一、金钱充斥美国政治全过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本质。金钱是美国政治的驱动力。美国庞大复杂的政治机器，只有在金钱燃料的推动下，才能持续前行。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润滑剂。离开金钱，美国政治根本无法顺畅运行。金钱政治贯穿了美国选举、立法和施政的所有环节，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选举沦为金钱游戏。选举的本来目的是表达选民意志、确定政策方向和选择合格的领导者。但是，美国的金钱政治却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金钱深深植根于美国选举的各个环节中。在所有层级的选举中，筹集资金都是参选者的入门条件。没有足够的金钱，根本无法参加竞逐任何重要政治职位。21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亿美元、2012年的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美国中期选举费用也快速升高。2002年到2014年间举行的4届中期选举分别花费21.8亿美元、28.5亿美元、36.3亿美元和38.4亿美元，2018年则达到52亿美元。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150万美元。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参加竞选的可能。只有少数有能力筹集大量竞选资金的人，才能加入美国政治选举角逐。这无疑为富人和利益集团通过金钱笼络候选人营造了温床。

除公开登记的选举经费外，大量秘密资金和“暗钱”也注入美国选举活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18年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不再要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报告捐赠来源，这大大降低了选举资金的透明度。自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非法“暗钱”持续涌入选举，不断创造新的纪录。2010年中期选举的“暗钱”为1600万美元，2014年中期选举的“暗钱”增加到5300万美元。到2018年中期选举，候选人以外的外部团体花费的“暗钱”剧增到9800万美元。在外部团体为影响国会选举而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40%是秘密捐赠者资助的。

二、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民主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因此必然体现资本家意志，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选举。通过选举把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政治人物推上国家领导职位，行使国家权力。为此，美国设计了一套精巧的政治体系和选举制度，对候选人和选民进行层层筛选，以保证那些让富人满意的人当选。最初，美国对选民资格进行种种限制，剥夺大批美国公民（如少数族裔和妇女）的选举权。后来，金钱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控制选举的最重要手段。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金钱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钱是个选择器，可以用来淘汰来自底层的政治参与者，使得穷人代表根本难以成为候选人。富人通过资助竞选经费的方式挑选合格的政治代理人，使他们成为候选人，进而赢得选战。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链接是天作之合。富人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来保障，政治人物需要借助金钱来进行选举。富人为了维护他们在国家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有很强的动力主动介入政治运作，寻求从联邦到地方政府的各级代言人。他们拥有最大份额的社会财富，可以满足政治人物的资金要求。政治人物可以充当富人的政治代表。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政治人物必须占有更多金钱才能参与一场正常的选举，进而赢得选举。于是金钱极为容易地充当了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点与终点。美国两大政党候选人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代表罢了。

利益集团的活动生动诠释了金钱政治的内涵。利益集团指的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的同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利益集团得以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利益集团的宗旨是参与权力运作过程，影响公权力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以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如联邦和州分权的联邦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它们可以向各级政府施加压力，左右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已深深嵌入美国行政机构、国会和司法系统之中，与政党和政府并列为美国政治的三大支柱。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有很多种，如提供资金、直接介入选举过程、帮助特定候选人赢得选举等，从而影响国会立法和未来政府决策；通过刊登广告、发表广播和电视演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影片等方式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对立法者和政府决策者进行游说，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美国的政府决策和国会立法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利益集团就是金钱政治的标本。利益集团的活动处处离不开金钱，是联结金钱与权力的枢纽，其功能就是将金钱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利益集团的资金越充沛，它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而金钱绝大部分掌握在富人手中。穷人也可以组成利益集团，但由于财政资源有限，注定不会发挥很大影响。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影响的还是一些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组织，因为只有这些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资金。例如，在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企业花在选举上的资金是工会的10倍。虽然2010年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支出限额取消了，但许多工会组织已达到其支付能力上限，无力进一步增加政治支出。相反，企业的政治花费急剧增加，影响力迅速扩大。企业加大政治投入当然是为了在政策制定中尽可能放大自身利益。

游说是金钱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游说是一种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游说的法理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46年的《联邦游说管理法》、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和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形成了规范游说活动的法律体系。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允许各群体结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因此，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各利益集团雇佣说客，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进行游说，影响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谋求自身利益。40多年来，美国游说业发展迅猛，呈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个注册说客，到1981年增加到2500个，2009年又增加到13700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利益集团在说客身上的花费与日俱增，1998年为14.4亿美元，2011年已狂飙至33.3亿美元，14年间增长幅度达131%。

三、美国金钱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19世纪后期，美国的金钱政治发展成为“政治分肥”制度。竞争获胜的政党通常将官位分配给为选举做出贡献的人，主要是本党主要骨干和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政治分肥”造成政治腐败蔓延，官员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下。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试图对政治捐献做出一些限制，但没有改变美国民主制度的金钱政治本质。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漏洞和后门，实际使金钱政治取得合法地位。

第一，“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捐款限额。“超级筹款人”是拥有大量财富和社会关系的人，比如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管理人、演艺界明星或说客。他们人脉多，神通广大，能利用个人关系网把大量小额捐款人凑在一起，为候选人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个人筹款金额中的三分之一是由1000个“超级筹款人”帮助完成的。同时，“超级筹款人”制度还能绕过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才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接受捆绑捐款的候选人，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金主。这使得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取消对“软钱”的限制。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了那些通过捐给政党来支持特定候选人的“软钱”，即不受《联邦竞选法》限制但又用于影响联邦选举的资金。但是，这个法律受到持续挑战。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威斯康星州‘生命权利’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裁决，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有关限制企业、工会和贸易团体资助特定选举广告的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关于竞选最后阶段限制公司、工会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相关规定违反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一裁决将《两党竞选改革法》的内容否决殆尽，使得“软钱”可以合法地大规模进入选举活动，打开了金钱肆意流入政治的闸门。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元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

第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金钱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政治行动委员会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种由企业或独立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筹款机构，主要是为了规避美国法律对个人和机构政治捐款的限制。它们从许多个人手中收集金钱，然后决定为哪些候选人捐款。政治行动委员会与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代表它们进行造势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实际上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参与选举的“白手套”。1971年《联邦选举法》通过后，政治行动委员会由于限制较少而进入大发展时期。大量企业、个人和利益集团的金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管道参与竞选。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企业与个人向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由此，政治行动委员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根据无党派非营利研究机构“政治责任中心”的数据，截至2016年8月8日，美国登记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2316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强大的募款实力，在各个方面对选举产生影响，尤其是企业和富豪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无限制地投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而间接影响选举。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捐款最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优先行动”，达到1.76亿美元。富豪索罗斯向“美国优先行动”捐款600万美元，而对冲基金管理人托马斯·斯泰尔更向支持希拉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5700万美元捐款。

四、金钱政治后果恶劣

第一，金钱政治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尽管美国经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但美国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实际上受到严苛限制。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2010年至2015年，美国有21个州通过了限制投票权的新法律，有14个州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实施了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的主旨是阻止穷人登记投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7年11月21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已有9个州通过立法，剥夺任何未付律师费或法院罚款者的投票权。仅在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10万名欠费者被剔除出选民名单，约占该州选民人口的3%。这导致美国选举投票率降低。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全国的平均投票率仅为37%。

第二，政府官职成为富人和上层阶级的禁脔。按照美国政治惯例，获得选举胜利的候选人通常会把一些政府官职奖赏给那些选举有功人士，其中就包括捐款大户和重要筹款人。美国历任总统上任后，都会任命一批金主当驻外大使。2000年总统选举后，政府中三分之一的新职位被胜选总统的亲友和金主接掌。2008年总统选举时支持胜选总统的556名“超级筹款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时任政府内阁中获得职位或者成为顾问，其中筹款超过50万美元的筹款人有近80%都获得了重要职位。

第三，金钱政治明目张胆地向富人输送利益。政治献金带来的一个恶果是，少数富人拥有了比绝大多数人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政府政策图利富人、损害穷人利益。金钱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富人通过竞选捐款和利益回报承诺俘获政客，使政客代表他们的利益立法。通过金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必定会在制定政策时向有钱人倾斜，或明或暗地向资本输送利益。这是一种变相的权钱交易。众所周知，2017年上任的共和党政府是富人政府。美国国会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虽然有“减税”之名，但并非普遍减税，而只是给富人和大企业减税，穷人反而要加税。根据这个法案，一方面，富人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大幅降低，从39.6%降至35%，足足降低了4.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贫穷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却从10%增加到12%。这个法案使最贫穷家庭遭受金钱损失，最富有家庭获得巨大收益。2017年底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6%的美国人反对这一税收改革法案，支持的只有29%。就企业税收而言，《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大型集团公司和上市企业等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降低了15个百分点，幅度很大，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数的8.6%。相反，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减税政策，需要根据合格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允许抵扣20%收入，适用最高边际税率37%。金钱政治蚕食了社会平等，从根本上腐蚀了美国的社会公正。

第四，金钱政治增加解决紧迫政治社会问题的难度。在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是一个困扰社会多年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校园枪杀案和公共场所枪杀案等大规模枪支暴力案件时有发生。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事故和自杀，有1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有20多万人因枪击受伤。如果严格控制枪支，这些伤亡大多可以避免。但是，美国步枪协会等反对控枪的利益集团通过介入选举和进行游说成功地瓦解了控枪努力。这些利益集团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仅2010年至2018年间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1.13亿美元。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主要的反控枪组织，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游说组织，每年运营经费高达2.5亿美元，竞选年份经费更多。由于投入大量金钱，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美国反枪支管制利益集团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封杀了所有控枪法案，使美国枪支管制更加宽松。

金钱政治暴露美国社会本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楷模”，要全世界都向它学习。但是，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美国的谎言。美式民主是富人和资本家的民主，跟下层民众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金钱的人才能享受。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压了“美式人权”。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中俄伊海上联演等议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宫其芳**、特约记者**马玉彬**报道：在26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中俄伊海上联演等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美军高官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是“贼喊捉贼”

有记者问：近期，美军高官频繁发声，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中国有个成语，叫‘贼喊捉贼’。美方官员对中方的无端指责，依我看，字字句句说的都是美国自己。”吴谦说，近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侵犯他国主权，所到之处硝烟四起，无辜民众伤亡巨大，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吴谦指出，美国2019财年国防费高达7160亿美元，不久前通过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一步将国防费增加至738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居然还好意思指责他国军费规模巨大？”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吴谦说“美国劣迹斑斑”。他表示，美国对他国大肆开展网络窃密和网络攻击行动，在斯诺登事件上还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是最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国指手画脚的。

在太空问题上，吴谦表示，美国成立太空部队，大力发展太空作战力量，推动太空军事化和军备竞赛，严重威胁太空的和平与安全。

“从美国在南海的表现看，应该叫它‘航行霸权行动’。”吴谦说，美方这种行为严重侵犯沿岸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严重危及一线官兵生命安全，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错误的行动源于错误的理念。”吴谦指出，美方对中国发展的打压遏制，源于其“中国观”走入歧途；美方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过度追求，源于其“安全观”狭隘自私；美方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破坏，源于其“世界观”出了问题。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美方着眼大局，改正错误，同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吴谦强调。

敦促美方不得实施国防授权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针对美方签署包含多项涉华消极条款的法案一事，吴谦表示，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实施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吴谦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他表示，美方公然插手香港和新疆事务，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抹黑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手段卑劣、用心险恶”。他强调，美方任何以此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实施法案涉华消极条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吴谦补充道。

中俄伊将举行海上联演

吴谦说，根据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军队达成的共识，中俄伊海上联合演习将于12月27日至30日在阿曼湾地区举行。中国海军派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三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合作，展示三方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海上安全、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意愿和能力。

“这次演习是中俄伊三国开展的正常军事交往活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与地区形势没有必然联系。”吴谦说。

中坦两军将举行联合训练

根据中国、坦桑尼亚两军达成的共识，12月下旬至2020年1月中旬，中坦“真诚伙伴-2019”联合训练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吴谦说，此次训练旨在深化中坦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新款作业服正在试穿试用

针对网上出现的中国军人身着的夹克式军装，吴谦表示，这是为积极适应国防和军队改革，优化完善我军军服体系，着眼办公环境穿着需要，按照结构简单、干练利落、便于指挥作业的要求，研发设计的“作业服”，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试穿试用，检验勤务适用性和穿着效果。

2019年全军实战化训练掀起新高潮

吴谦说，1月4日，习主席发布训令，引领激励全军官兵实战实训、按纲施训、从严治训，不断深化新时代练兵实践，实战化训练掀起新高潮。

一是战略训练牵动战区联合训练和军兵种部队训练创新发展，军委机关部门训练为全军带了好头；二是各方向各领域应对现实安全威胁训练针对性更强；三是群众性大练兵向关键岗位深化、向核心能力聚焦、向新质力量拓展；四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实现“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的筹办目标，在世界军人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五是开展41场中外联演联训联赛，对外军事训练交流与合作综合效益更加明显；六是举办全军院校长集训，决策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和院校优先发展战略，立起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七是出台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训练监察向为战练兵持续发力，形成声势；八是重构军事训练保障体系布局，训练基地和模拟蓝军建设迈出新步伐，编修600余本训练大纲、4000余本配套教材，军事训练法规教材不断更新完善。

“一年来，全军官兵刻苦训练、科学训练，不畏艰难险阻，苦练杀敌本领，练出精兵劲旅，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吴谦表示。

12月25日，在即将跨越传统海疆线之际，我海军第34批护航编队在某海域举行“向祖国告别”主题宣誓签名仪式，激励官兵发扬护航精神，守护和平、传播友谊，勇闯大洋、为国争光。图为宣誓仪式现场。 本报特约记者 **陈润楚**摄

第四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议在首尔举行

新华社首尔12月26日电 （记者**陆睿**）第四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议26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和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崔起荣等出席会议。

三国科技部长在会上交流了科技政策，探讨了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提升科研能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必要性，并展望了各国共同关切领域的合作前景。三国同意在工作层面就恢复执行中日韩联合研究计划开展磋商，该计划迄今共成功实施8个项目。

会议还探讨了促进三国青年科学家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和途径，并商定于2021年在日本举办第三届中日韩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会议决定，中日韩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作为中日韩科技部长会议下的一项独立活动，由三国每年轮流主办。

王志刚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加强睦邻友好、合作发展符合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也是本地区稳定繁荣的需要。

会议期间，中国科技部提议将2020年确定为“中日韩科技创新合作年”，由三方共同举办相关活动，旨在提升三国科技创新合作水平。